

第1章

绪论

我们正处于新时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上一次的百年变局，是中国人的觉醒年代；这一次的百年变局，是中国的腾飞时代。一百年前，觉醒年代，语言曾经扮演过重要的角色；一百年后的今天，人类的发展同样离不开语言。如何与时俱进，直面人类社会史无前例的语言超级多样性引发的种种问题，是摆在语言学家面前的迫切任务。

——刘海涛，2021

1.1 现代语言测试视阈下口语策略能力概述

语言测试（language testing）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被测试者和测试任务或独立作用或相互作用，对被测试者的测试成绩产生影响（Bachman & Palmer, 2010）。在现代语言测试领域，理解语言测试本质上就是采用互动式的方法理解被测试者语言能力（language ability）在测试中的作用，即语言能力与测试任务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对测试表现的影响（Bachman, 2007）。被测试者的语言能力由多个要素构成，其中，策略能力（strategic competence）是反映语言测试本质的语言能力的核心要素（Bachman & Palmer, 2010；何莲珍、张娟，2019）。一些学者（如Bachman & Palmer, 2010；Ellis et al., 2019）认为，在测试过程中，被测试者的策略能力与测试过程中各变量密切相关，被测试者的策略能力是其语言能力和实际语言使用情境间的有效中介（mediator）。在四项语言（听、说、读、写）技能中，口语对策略能力的要求最高，和策略能力的关系也最为密切（Huges & Reed, 2017；Zhu et al., 2019；刘建达，2021）。在口语研究领域，策略能力

长期以来被看作是语言学习者口语能力的内在组成要素，对口语表现至关重要（Bygate, 1987; Fulcher, 2014; Seong, 2014）。口语产出被认为是说话者使用策略能力完成口语任务的过程。正是因为策略能力在口语产出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作用，语言测试学者（如 Barkaoui et al., 2013）普遍认为，口语测试可以极大地刺激被测试者使用策略能力完成指定任务，并可以立刻刺激反映被测试者策略能力的在线计划（online planning）策略、自我监控（self-monitoring）策略以及自我评价（self-evaluating）策略的使用（Cohen, 2014）。而口语测试任务对被测试者策略能力的刺激作用也说明了策略能力对测试情境下英语口语产出的重要性。

尽管策略能力在语言测试和口语研究领域都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但在这些研究领域特别是语言测试领域中，如何定义策略能力及其作用仍然存在分歧。实际上，不管是理论层面还是实证研究层面都有很多关于策略能力及作用的不同定义和分类（Huang, 2013; Phakiti 2003, 2016; Seong, 2014）。其中，Bachman（1990）及 Bachman & Palmer（1996, 2010）将策略能力定义为制定目标（goal setting）、自我评价及规划（planning）。同样，Chapelle（1998）也强调元认知策略在语言测试中的重要性，指出如果语言测试在被测试者和测试任务之间相互作用，那么必须把元认知策略视为两者之间的中介。一些研究人员（如 Barkaoui et al., 2013; Swain et al., 2009）通过实证研究也提出，被测试者在测试中使用的元认知策略在测试任务和成绩间发挥中介作用。

基于语言测试领域对策略能力的认知，明确策略能力和测试任务及测试表现间的复杂关系被视作是现代语言测试领域的根本问题（Bachman, 2007），也是当前语言测试领域面临的重大挑战（Huges & Reed, 2017）。尽管如此，在语言测试领域，口语策略能力研究一直存在研究不足的问题（O'Sullivan, 2011; Zhang et al., 2021a, 2022a, 2022b），这凸显了在口语测试情境下探究语言测试根本问题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1.2 口语策略能力与我国英语教育

鉴于策略能力对于现代语言测试及口语产出的重要作用,策略能力研究对我国外语教育特别是英语口语教育尤为重要,不仅可以改善我国当下英语课堂教学的不足,更是与我国当前教育改革的目标一致。

1.2.1 我国英语教育现状

在我国教育体系中,英语课程是义务教育阶段的必修课之一,英语教育的根本目标是让学生通过使用英语,特别是通过听、说技能进行有效的交流沟通(教育部,2017)。到了高等教育阶段,对于多数高校而言,学生顺利获得毕业证书及相关学位证书的必要条件之一就是要通过一定级别的英语考试,如大学英语四级、六级考试(Haidar & Fang, 2019)。同样,在就业市场,英语是找到好工作的“敲门砖”,对人们在职场上获得高薪工作也发挥重要作用(Haidar & Fang, 2019)。正是由于英语学习在国内教育及就业方面的重要性,我国在英语教育方面投入巨大。从数量上看,我国英语学习者人数早在2015年就达到了4亿(Wei & Su, 2015),超过了以英语为母语的英国和美国人口之和(Fang, 2018)。

尽管英语学习在我国教育体系中举足轻重,口语在英语教育中也极为重要,但是截至目前,除一些经济发达的一线城市(如上海、北京)将英语口语作为基础教育测试环节之外,英语口语并没有像阅读、听力及写作那样作为核心指标被纳入国家宏观基础教育测试体系。因此,口语虽被认为对英语教育很重要,但在实际课堂教学中,不管是教师还是学生均不够重视口语,常以课外或自学形式开展口语教学。正是受到这些教学现况的影响,对于我国多数英语学习者而言,学习英语多年之后仍然难以胜任现实世界的交流任务是普遍存在的现象(束定芳, 2022)。在以口语为主要交流媒介的语言应用中,学生往往很难正确表达自己的想法,“哑巴英语”学习者特征明显(窦淑芳, 2013; 张健, 2006)。一些大型英语测试(如大学英语四级、六级考试,托福、雅思)数据也表明,在四项英语语言技能中,我国英语学习者的口语表现差强人意。

作为英语教学的产物,我国英语学习者的“哑巴英语”现象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这样一个事实:长期以来我国英语课堂教学通常强调学生的语言知识(language knowledge)(如词汇和语法),而不是学生的语言使用能力及策略能力(Cai, 2012; 束定芳, 2022)。如前文所述,策略能力和口语的关系最为密切,口语是四项语言技能中对学习者的策略能力要求最高的语言技能(Cohen, 2014)。因此,策略能力缺乏会导致我国英语学习者口语表达能力薄弱(Sun, 2014; Tubbs, 2016)。此外,我国英语课堂教学通常是将听、说、读、写分开独立教授而不是把这些语言技能综合起来教授(曹德明等, 2021)。在现实语言使用环境中,听、说、读、写是相互依存的,不论是在逻辑上还是在实践上均不可能把语言使用分解成孤立的语言技能。因为语言使用者须先接受书面或口头形式的输入,才能开始真正的交流(Crossley & Kim, 2019)。由于我国英语教学长期以来缺乏对学生策略能力培养的关注,课堂教学活动也未能模拟真实语言使用情景,因此我国英语学习者难以胜任现实口语交际任务(Pan & Li, 2009; Sun, 2014; Tubbs, 2016)。

1.2.2 我国外语教育改革

在我国语言教育领域,语言评价一直被视作语言教育发展的“指挥棒”,对提升我国整体教育水平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2020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再次肯定教育评价作为教育发展“指挥棒”的作用,同时提出我国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的根本目标之一是构建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充分利用信息技术,提高教育评价的科学性、专业性和客观性。大量研究已经证明,实现个人自主、可持续终身学习的核心要素就是培养个人策略能力(Oxord, 2017; Teng, 2022; Zhang et al., 2021b)。从这个角度来说,实现全民终身学习就有必要在我国教育体系,包括外语教学中,强化策略能力培养。如上文所述,策略能力培养一直是我国英语教学课堂中的“短板”,大多数英语教师对如何开展策略能力教学缺乏一定的经验(曹德明等, 2020; 束定芳, 2021)。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如何顺利推进课堂策略能力教学,包括如何界定中国英语学习者的策略能力,如何开发、选择适合策略能力的课堂教学成为广大英语教师亟待解决的教学实际问

题。另一方面,如何设计适合对学生策略能力进行评价的评价任务或测试任务也是教师及测试人员需要思考、解决的问题。

将现代科技技术运用于教学评价不仅体现我国教育评价改革的目标,也顺应时代需求。在线教学已成为全球教育领域的热点话题,对学生英语学习进行在线评测,对其学习结果进行有效反馈的在线语言测试也同等重要。作为实现在线语言测试媒介的计算机辅助语言测试因此成为当下多数一线英语教师、研究人员关注的焦点。其焦点集中体现在针对课堂教学的具体问题,包括如何选择、设计符合学生语言水平、有效激发学生策略能力的测试任务,特别是英语口语计算机辅助测试任务,以及现有计算机辅助语言考试(如雅思、托福、培生等)中的口语测试任务是否可以直接应用于我国英语课堂教学,并实现培养学生策略能力的教学目标等(Zhang et al., 2021a)。

策略能力及计算机辅助测试对我国当前教育改革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教育评价改革及在线测试的需求中,也体现在我国当前进行的义务教育阶段“双减”政策的落实及高等教育阶段课程思政背景下外语课程的改革中(刘建达, 2020; 束定芳, 2021)。2021年7月24日起,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为目标的“双减”政策实施于英语教育改革中,其重点是培养有实际应用能力的英语使用者,而不是培养擅长死记硬背的英语学习者(束定芳, 2020)。实际上,“双减”英语教育改革重点体现了我国英语教学一贯秉承的根本目标:培养学生使用英语特别是使用听、说技能进行有效交流的能力(教育部, 2017)。显然,此轮改革再次强调要培养学生使用英语的策略能力,这充分说明策略能力不仅对于英语口语教学作用显著,而且对我国宏观英语教学目标的实现也具有决定性意义。自2020年8月教育部印发《高等学习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以来,如何切实、有效地将思政元素如“盐融入水”一般融入外语课程,帮助学习者在思政方面真正成长也是我国外语教育界讨论的热点话题。不少学者指出,实现思政元素自然融入外语课程的关键之一就是“教材的编写应从语言知识的传授转向语言使用能力的培养”(刘建达, 2020: 39)。而作为语言使用能力的核心要素,策略能力培养显然是教材编写过程中需要重点关注的议题。

结合我国当前各项教育改革政策不难发现,其核心问题都和我国英语学习者的策略能力培养密切相关,而新时代信息技术在教育领域发挥

的不可或缺的作用也进一步明确了在计算机辅助语言测试情境下开展策略能力研究的必要性和时代性。

1.2.3 我国教育国际化

随着全球化步伐加快,中外合作蓬勃发展,我国国际交流活动也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态势。其中,国际合作办学及出国留学发展势头强劲,表现抢眼。基础教育阶段的国际高中数量和大学文化交流项目的数量急剧增长,许多中国英语学习者选择出国接受高等教育。现有数据表明,自2018年初,我国开展对外文化交流项目的大学数量已经到达2626所;2019年我国国际学校数量已达1000所左右,位居全球第一(张优良、黄立伟,2019)。无论是国际学校还是对外文化交流项目对学生的英语水平要求都比较高,入学要求往往包括通过雅思、托福等国际英语语言测试。但是不少学生因为口语成绩不合格无法顺利入学。同样,即便口语考试顺利过关,很多在国外留学的中国学生常常“无法流畅地使用英语来表达思想和被他人理解”(Tubbs, 2016: 3)。因此,国内外一些学者(如Gorsuch, 2011; Tubbs, 2016; 周黎红, 2020)指出,面对中国教育国际化热潮,中国英语学习者在英语口语方面还没有做好充足的准备。

与此同时,语言能力是当前我国语言规划与政策的热点研究问题。国家语言能力是指一个国家处理国内外重大事务包括国际合作所需具备的语言能力。2016年《国家语言文字事业“十三五”发展规划》首次提出“国家语言能力”这一理念,并指出我国的“国家语言能力”还无法完全适应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需求。提升国家语言能力,特别是我国所具备的作为国际通用语言的英语语言能力因此被视作是我国语言规划与政策的重大目标之一(周庆生, 2019)。近些年来,在国际舞台上“说好中国故事、让世界听见中国声音”的国家发展宏观目标和时代使命也对我国语言政策和规划中英语语言能力提出了新的高要求(刘海涛, 2021; 沈骑, 2020)。2022年10月16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我国第二个百年大计,语言规划和政策核心工作是在世界舞台上“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与该要求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前文所述我国英语学习者普遍存在的“哑巴英语”问题。显然,如

果不提升学习者的口语策略能力,有效解决“哑巴英语”问题,我国英语教学特别是英语口语教学就无法培养出可以胜任国际舞台的英语学习者,也就无法适应我国语言规划与政策的时代发展需求,实现我国外语教育特别是英语教育的国际化发展方向和发展使命。

1.3 现代语言测试视阈下口语策略能力研究问题与我国英语教育

策略能力和测试任务及口语测试表现间的复杂关系不仅涉及语言测试,而且涉及心理学、应用语言学和教育等跨学科研究领域,但是关于三者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较少。首先,关于策略能力和测试表现关系的实证研究主要集中于非测试情境下的听力、阅读和写作三项语言技能(如 Ajzen, 2002; Akkakoson, 2013; Chang, 2012; Qin, 2018),且研究人员通常只研究策略能力构成要素独立作用的工作模式,较少关注这些要素在实际研究情境中的交互作用模式(如 Barkaoui et al., 2013)。因此,关于策略能力在口语测试情境下与测试表现关系的实证研究较为匮乏;其次,现有关于测试任务的实证研究中,测试任务常被视为两个任务特性变化的集合或单一整体。但在现实世界中,语言使用往往包含多个同时变化的任务特性(Bachman & Palmer, 2010)。此外,研究者通常使用自主设计的测试而不是真实的口语测试,因此,测试任务的有效性和可靠性以及研究结果的普遍性值得商榷;再者,现有实证研究主要是针对策略能力与口语测试表现及测试任务与测试表现间的两两相关研究,无法体现三者语言测试过程中的互动特征(Seong, 2014)。事实上,关于三者之间的复杂关系的研究非常有限,是语言测试领域需要进一步研究的根本问题(Zhang et al., 2022b)。

现代语言测试视阈下口语策略能力研究的不足及策略能力对实现我国全面发展的重要性使得本研究无论对于课堂教学还是我国英语教育的长期规划都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同时,现有关于现代语言测试视阈下口语策略能力的研究也为本书提供了理论及实践基础。具体而言,本书以计算机辅助综合口语测试任务构建现代语言测试视阈,以反映策略能力的非互动性语言使用框架(Bachman & Palmer, 2010)为策略学习元认

知模型 (Chamot et al., 1999), 以《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及双语口语产出模型 (Kormos, 2011) 定义策略能力, 以及以体现任务特性的三维元素框架 (Robinson, 2015) 定义测试任务。本书基于此开展计算机辅助综合口语测试任务所构建的现代语言测试视阈下中国英语学习者口语策略能力的全面研究, 包括对策略能力、测试任务及测试表现间复杂关系的研究。为完成该研究目标, 需要解决两大问题: 第一, 中国英语学习者在处理计算机辅助综合口语测试任务时, 其策略能力表现如何? 具体来说, 是否存在个体差异? 是否与其语言水平有关? 第二, 中国英语学习者在处理计算机辅助综合口语测试任务时, 其策略能力和测试任务及测试表现间的关系如何? 本书将以这两大问题为主线开展理论及实证研究: 以理论研究作为实证研究的理论框架, 确定策略能力、测试任务及测试表现; 以中国英语学习者为研究对象, 探讨如何开展口语策略能力研究, 包括如何研发口语策略能力的测量工具, 从而为现代语言测试领域策略能力相关研究增添中国元素, 增加我们对现代语言测试领域根本问题的认知。

1.4 策略能力研究易混淆术语及概念

在策略能力研究与计算机辅助综合口语测试研究领域, 有些术语及概念容易混淆, 概念、术语模糊不清的现象时有发生。这些概念和术语主要包括: 元认知策略 (metacognitive strategy) 和认知策略 (cognitive strategy)、独立语言技能测试与综合语言技能测试、二语与外语、中介项与调节项, 以及模型与框架。

1.4.1 元认知策略与认知策略

元认知策略强调自我监控、检查或管理认知的各种过程; 认知策略侧重于说明制造这些过程的策略 (Flavell, 1979, 2000)。就运作模式而言, 认知活动发生在“客观层面”, 而包括元认知策略在内的元认知活动发生在“元层面”。客观层面的信息通过自我监控传递到元层面, 元层面则通过控制过程给客观层面发出指令 (Nelson, 1996)。在语言测试

中，认知策略可能包含在语言能力中，而元认知策略是指有意识的和经过思考的高阶执行能力，它为完成任务所使用的认知策略提供认知管理（Bachman & Plamer, 1996）。简而言之，元认知策略就好像“建设工地的管理者”，对于认知策略这一“建设工地的建筑者”给予指导和发出指令，帮助学习者构建并创造他们的语言“大厦”（Oxford, 2011）。

尽管元认知策略和认知策略存在根本差异，但两种策略在心理活动过程中并不是独立的，“认知策略的使用似乎与具有更高执行能力的元认知策略共同发挥作用”（Purpura, 1997: 314），因此很难精准界定两者的不同（Brown et al., 1983; Yi, 2012）。此外，不同研究人员对元认知策略和认知策略的理解也存在不同，某一研究人员所认为的元认知策略对另一研究人员而言就是认知策略（O'Mally & Chamot, 1990）。元认知策略和认知策略的重叠特征在许多实证研究中得到了很好的例证。比如，在 Phakiti（2016）和 Purpura（2013）的研究中，解决问题被视作是认知策略，但在 Chamot et al.（1999）的研究中解决问题被归类为元认知策略。因此不少学者（如 O'Mally & Chamot, 1990）提议，在研究中应明确元认知策略和认知策略之间的区别。基于此，在本书中，解决问题被定义为元认知策略（参考 3.4.4）。

1.4.2 独立语言技能测试与综合语言技能测试

独立语言技能测试是指对被测试者某个单项语言技能进行测试，而综合语言技能测试则是指对被测试者的多个语言技能同时进行测试，如针对被测试者读、听、写或者听、写技能的综合写作测试（Barkaoui, 2015; Kim & Kim, 2017; Yang & Plakans, 2012），或本书涉及的听、读、说或听、说的综合口语测试（Zhang & Zhang, 2022; Zhang et al., 2021a, 2021b, 2022a, 2022b）。

1.4.3 二语与外语

根据权威语言词典的定义，二语和外语是两个不同的概念（Crystal, 2011; Richards & Schmidt, 2013）。第二语言并不是母语，而是学习者

通过后天习得的一种语言，外语是指个人学习的、在自己国家内使用但属于其他国家的语言。简单来说，一种语言是不是二语主要取决于学习者看待它的视角，而外语则指在该种语言不属于母语的地方使用的语言。虽然二语和外语是不同的概念，但很多学者（如 Bachman & Palmer, 2010；Purpura, 2016）将两者混合使用并统称为二语。遵旨这一原则，本书也使用“二语”这一概念统一指代第二语言和外语这两个本质上不同的概念，因此，第二语言学习者和外语学习者在本书中统称为“二语学习者”。

1.4.4 中介项与调节项

对于某个具体研究，中介项往往是指与因变量和自变量都具有相关性的变量，它可以解释这两种变量之间发生相关性的原因及具体过程；相反，调节项虽然未必与因变量和自变量都有相关性，但它可以影响两类变量间关系的强度和方向（Hayes, 2018；Karazsia & Berlin, 2018；Mackinnon, 2011）。Bachman & Palmer（1996，2010）提出策略能力是测试任务和测试表现间的中介项，但是在 Kormos（2006，2011）的外语口语产出模型中，策略能力则被视作是外语口语产出的调节项。图 1-1 显示了中介项和调节项的区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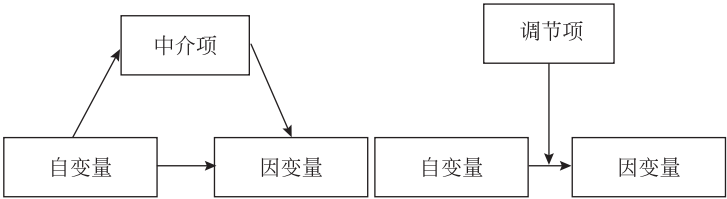


图 1-1 中介项和调节项的区别

1.4.5 模型与框架

模型与框架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模型指从理论上诠释能够通过二语进行沟通的意义，而框架指根据测试情境从某一模型中选择的某种技